

附 錄

中華民國100年外交年鑑

一、總統之外交言論摘錄

(一) 今天這個活動可以彰顯政府服務民眾的另一個層面。在此我要特別肯定外交部這幾年的努力，儘管我們只有23個邦交國，但是給予我們免簽證或落地簽證的待遇，在我上任時有54個國家，現在我們已達到96個。在國人常去的國家中，94%已經是免簽證或落地簽證，應該算是我國外交史上重要的里程碑。

事實上，我們能得到免簽證待遇，是因為我們的國家受到尊敬，國民才有這樣的尊嚴。國家受尊敬，一定是各方面的表現被國際肯定。我們都知道外交是內政的延長，在此我特別與各位分享個人的經驗。民國64年，1975年我在紐約大學念書，選了一門國際法，讀到有關「國家承認」的判例，是美國聯邦上訴法院（United States Court of Appeals）在舊金山第九巡迴區的一個判例，該案是由第一審的地方法院來的，而該地方法院在上海，叫做「美國在華法院」（United States Court for China），可以受理當時美國人在中國發生的民、刑事案件。該案情是蠻簡單的，就是北伐時國民革命軍光復了武漢，在武漢有家廠商向美國的保險公司投保火險，房子燒毀，就向美國的保險公司求償理賠。因為那棟大樓已被國民政府接收，而當時美國尚未承認國民政府，因此保險公司認為，既然沒有承認，國民政府沒有訴訟的權利。一審國民政府被判敗訴，到了二審，當時18省中，國民政府已光復15省，同時國務院也去函表示要跟我們簽訂條約，法院就認為美國政府實質上已經承認國民政府，所以上訴逆轉，國民政府贏了此案。其實，輸贏還在其次，讓我感覺很不舒服的是，為什麼在我們的國土上，有外國的法院可以進行審判？當然是因為「治外法權」。該法院在1906年設立，直到1943年1月11日才

撤銷，因為我們與英、美各國簽訂了平等新約。

何以有此發展？國父於民國14年過世時，遺囑中說到：「余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餘年……積四十年之經驗，深知欲達到此目的，必須喚起民眾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後面又講到：「最近主張召開國民會議及廢除不平等條約，尤須於最短期間，促其實現。」廢除不平等條約是國父提倡民族主義非常重要的目標，可是直到他過世為止，都沒有任何突破。但為什麼到民國32年就能突破？會有這個發展，主要是因為當時的中國獨立抗戰了4年，直到珍珠港事變後，美國和我們陸續向日本、德國和義大利宣戰，變成戰時的盟國。事實上，中國在戰場上牽制了數百萬日軍，減少日軍在太平洋戰場上的戰力很有貢獻，所以英美各國才覺得，再維持這種不平等條約，實在是不公平，因此英、美兩國分別都在1月11日和我們簽訂平等新約，達到廢除不平等條約的目的。

1月11日恰好就是歐盟給予我們免簽證待遇生效之日，同時這天也是我們的司法節。很多人不知道為什麼定這天為司法節，就是因為當時我們在國際上受人尊敬，也讓人感動。獨立抗戰4年，最後國軍共有332萬人殉職，將領就有200多人死亡，是所有盟國裏損失最慘重的國家。其實一個國家要求其他國家的國民，在入境時要使用簽證，並不違法，我們也還維持著某些國家人民來到我國需要簽證的做法，關鍵就在於國家的形象、國民的素質是否能讓人放心。我們已經達到這樣的水準了。國家要獲得尊敬靠的不是船堅炮利，所以我在今天和去年的10月10日都強調，中華民國在國際間要扮演的角色是：第一、和平的締造者；第二、人道援助的提供者；第三、文化交流的推動者；第四、新科技與商機的創造者。同時我在今天的元旦祝詞裡也提到，我們還要

做中華文化的領航者。這些「軟實力」都能讓其他國家尊敬我們，並且讓他們感動。

我上任後推動「活路外交」，強調的不是國防或其他方面，而是要怎麼樣讓人家感覺到，中華民國的存在對他們有幫助。我們到海地救災，在災害發生約24小時，就抵達現場。許多外國媒體非常驚訝，臺灣在半個地球以外，怎麼會這麼快到達現場；而且臺灣又不是什麼大國，為什麼這麼熱心。我們當時所提供的人力或資源，在全世界都排名前五名，讓人感動、令人敬佩。

美國前總統柯林頓來到臺灣訪問，剛好他對海地有特殊感情，因為他和他的夫人當年是在海地度蜜月，所以海地發生地震，他首先趕過去。柯林頓總統在國際間有不錯的聲望，對於我們在海地做的很多工作，尤其是剛才吳敦義院長提到的，為了八八水災災區所發展出來的「永久屋」模式，柯林頓總統非常感興趣，這正是災區需要的一種制度。

諸如此類，我們當初做的時候沒有想到會在國際間發生什麼影響，但是我們在國內將這些事情做好，影響力就可以逐漸地擴散到國外。世界展望會臺灣分會和我們的家扶中心，在全球認養了28萬名貧童，國外的就有18萬人；很多人都不知道，臺灣在這方面貢獻很大。同樣地，我們的慈濟功德會和其他的宗教團體，在全世界都做了很多善事，累積了國際社會對我們的好感，例如慈濟在印尼，成功地整頓一條叫做「紅溪河」的河流，之前非常髒、臭，慈濟改善後在旁邊建造了廉價的國民住宅，幫助許多當地人。所以當他們要到緬甸救災，緬甸不准任何其他國家去，就准慈濟去。印尼亞齊發生大海嘯時，臺北市政府派團去，他們不讓我們進去，慈濟卻通行無阻。所以各位可以知道，「軟實力」有時比「硬實力」還重要。後來市政府的救援團隊是如何進到

印尼的呢？我當時一籌莫展，飛機、材料、設備、醫療用品都運抵棉蘭，但是到不了亞齊，因為沿路還有叛軍，在那種情況下突然接到一通電話，是一位略帶南洋口音的女士，她說：「馬市長，你放心，我們都安排好了，你們的材料可以放在我的發貨倉庫，沿路我們已經和印尼的海軍陸戰隊講好，相關問題都解決了。」我問：「請問妳是？」她說：「叫我李太太就好，我是留臺校友會的會員。」什麼是「留臺校友會」？就是我們過去招收的馬來西亞、印尼的僑生，在臺灣念完書之後回到家鄉，所組織的留臺校友會，現在變成臺灣最大的「樁腳」，這種時候他們站出來幫忙，這就是臺灣的「軟實力」。我們的僑生政策成不成功？成功！當初招收印尼僑生，也沒有想過有一天可以幫助我們在這個東亞最主要、人口相當多的國家，打開這個局面。

我舉這個例子，就是要說明外交是內政的延長，當我們有好的成果，慢慢地帶到國際舞臺上，有時會為我們帶來意想不到的收穫。這2年來，我們的23個邦交國相當穩固，與他們的合作持續加強中。無邦交國方面，則有包括歐盟等給予我們免簽證待遇，我們也在日本札幌設立辦事處，東京的羽田機場與臺北的松山機場也通航對飛了，同時我們和美國的雙邊關係亦有進展。代表著我們若能採取務實而靈活的態度推動對外關係，就有效果。今天國家的處境還是很艱難，只有23個邦交國，但在艱難的情況下，運用我們的智慧及軟實力，一步步地撐開局面，是非常了不起的成果。全世界很少有一個國家，在邦交國這麼少的情況下，還能維持如此大的國際能量，我要對許多駐外人員的努力與國內人員的配合，表達由衷的敬佩。

中華民國的外交在憲法上有很清楚的定位，第141條規定：「中華民國之外交應本獨立自主之精神，平等互

惠之原則，敦睦邦交，尊重條約及聯合國憲章，以保護僑民權益，促進國際合作，提倡國際正義，確保世界和平。」這些都是大家耳熟能詳的，但是在我們建國一百年之際，回想民國35年制憲時，加入這樣的條文，到今天仍有重要的意義。今天參加這個活動，深為我們的外交同仁感到驕傲，一方面為國家拓展更大的外交空間，同時也在國內提供更多的服務。希望大家堅持到底、全力以赴，讓國人更加感受到「當國家受到尊重，國民就有尊嚴」的道理。

（摘錄自1月1日馬總統出席「建國百年 百國免簽—外交為民服務成果展」開幕之致詞）

- (二) 今天非常高興，因為再過幾天，中華民國國民所持有的護照，就能通行全世界96個國家，而第97個國家——克羅埃西亞，也已同意給予我國國民免簽證待遇。過去人家說中華民國護照是「車輪牌」，現在變成「飛輪牌」，可以讓我們暢行國人常訪問國家中的94%，而只剩6%還未給我們免簽證待遇的國家，我們會繼續努力溝通聯繫。

除了省錢、省事之外，更重要的，就是歐盟對我們的國民投下了信任票。在68年前這個月的11日，是我們廢除不平等條約的重要日子。民國32年，也就是1943年1月11日，在重慶和華盛頓，同時簽署了平等新約，英、美兩國廢除從1842年鴉片戰爭以來的不平等條約，其中最重要的是廢除「治外法權」（extraterritorial jurisdiction）。當時的上海公共租界，還有「美國在華法院」（United States Courts for China）；所以各位可想像，那樣的發展對於抗戰了6年的中華民國，是多麼的重要。在當年的陪都重慶放假3天，有7萬人遊行，還做了一首《平等新約歌》，歌中最重要的內容講到「百年桎梏，一旦解除，萬民歡欣鼓舞」。所以兩相對照，我

在想歐盟真的有心，挑了這麼一個日子讓我們能回顧歷史。

當然，廢除不平等條約是消極地摒除了一種歧視。在世界各國的往來中，旅行的國民被要求簽證其實是正常的做法，給予免簽證則是一種禮遇。從廢除不平等條約進而得到禮遇，不僅代表我們和歐盟共同享有的價值是一致的，即「民主、自由、和平與繁榮」，也是因為臺灣的民主自由，加上兩岸的和平，使得推動這項工作時，減少了非常多的阻力。當年之所以能廢除不平等條約，是因為大家為了捍衛自由，聯合對抗法西斯國家，這是共同的價值。而現在共同的價值，是普世都追求民主與和平，因此在國家受尊敬的同時，國民也享有尊嚴。免簽證的成就令人感到欣慰，也證明過去2年7個月來推動的「活路外交」（Viable Diplomacy）有具體成效。我要特別感謝歐盟的朋友給予支持，也要感謝在座所有外交界先進的努力，希望往後有更多國家不但給我們免簽證待遇，也能提升雙方的實質關係，讓中華民國的國際空間更為廣闊。今天我們在這裡慶祝歐盟給我們免簽證待遇，希望要到歐洲訪問的國人，也要珍惜這份禮遇，在歐洲期間有符合國際社會要求的表現。

前年英國給臺灣免簽證待遇之後，去年我們到英國的訪客增加了106%，雙方的貿易也有二到三成的成長。所以可以向歐洲的朋友們保證，臺灣的旅客不但是好的觀光客，更善於購物消費，我希望在這方面雙方的交流能進一步增長。

（摘錄自1月7日馬總統出席「歐盟予我國人免申根簽證待遇」慶祝茶會之致詞）

- （三）今天是中華民國外交部一百週年的部慶，特別在這一天舉行「中華民國外交史料特展」的預展，意義非常深遠。

過去一百年中，外交部同仁已建立起一個重要的傳承，就是「艱苦奮鬥，走出活路」。各位應該都記得民國14年國父去世時，遺囑裡最重要的期待就是「廢除不平等條約」。他的這個遺願在18年後達成了。民國32年，我們分別與英國、美國簽訂平等新約，廢除幾百項不平等的條約，可以說「百年桎梏，一旦解除」。今天所展示的很多不平等條約的原件，可以讓大家都開眼界。

廢除不平等條約後，抗戰勝利、臺灣光復，中華民國成為聯合國安理會的常任理事國，國際地位大為提升。可是不旋踵間，大陸淪陷，政府遷臺，中華民國的外交也進入酷寒階段，遭遇無數的挑戰及艱辛。

即使如此，我們還是在聯合國提出控訴案，並在後來與日本簽訂《中日和約》，與美國簽訂《中美共同防禦條約》，逐漸地穩定我國的國防及外交，實在是非常了不起的成果。

在1970年代，我們失去聯合國代表權，也失去與美國的邦交，使得中華民國的外交再次陷入嚴重的危機，邦交國降到20多個。但是我們的外交人員沒有一秒鐘氣餒，一樣秉持「艱苦奮鬥，走出活路」的精神，持續在世界上許多地區重建力量。過去駐外單位曾經使用各種非傳統的名稱，之後我們又改回來，將它叫做「臺北經濟文化代表處」或「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除了23個大使館之外，我們在66個國家，一共有91個代表處及辦事處，讓我們的對外關係，尤其是非常興旺的經貿文化關係，能夠持續地發展。

除雙邊的關係外，我們這3年來也有機會重返聯合國的專門機構，包括兩次參加「世界衛生大會」（WHA），與加入《政府採購協定》（GPA），讓臺灣的經貿關係獲得更大的發展空間。

當我們的外交進入最低潮的時候，持中華民國護照真的很難在世界上走出去，可是我們一步步地努力，現在這個局面已經全面改觀了！到今年1月，已經有97個國家和地區給予臺灣免簽證或落地簽證待遇，國人經常訪問的地區中，更有94%可以獲得免簽證對待。

現在，我要向大家報告一個好消息，給予臺灣免簽證或落地簽證的國家，很快又要增加2個，一個是歐洲的蒙特內哥羅，一個是澳大利亞。蒙特內哥羅給我們的是免簽證待遇，澳洲則是以一種電子簽證的方式，與它給予其他國家的待遇完全一致，雖然時間還未確定，但是相關的協商已經完成。故現在給予中華民國國民免簽證或落地簽證待遇的國家及地區已增加到99個，所以「建國百年，百國免簽」的目標很快就要達成！

一個多月前，我們和菲律賓之間發生糾紛，造成外交上的困擾。經過外交同仁在這一段時間全力以赴，雙方達成協議：一方面菲律賓以正式、書面的方式，以及懲處失職官員等多項具體行動，展現其歉意及誠意。另一方面，菲律賓也準備與我國簽訂「共同打擊犯罪」的司法協助協議，讓類似事件不再發生。這使得我們和菲律賓的關係不但沒有倒退，反而更加強雙方的關係，這就是臺灣「活路外交」非常重要的例證，我要對外交部人員表達肯定之意。

今天的展覽只是「前菜」，還不是「大菜」。「大菜」有2千7百多項條約，界圖有600多幅，同時還有30餘萬件的檔案，將來會提供70個名額的臺灣獎助金給全世界的研究人員，來中華民國研究相關問題，這些史料數位化後也將成為國外「臺灣書院」非常重要的資產。

我們從小就聽過一句古語：「弱國無外交」。而中華民國外交部門所遭遇到真的是空前挑戰，但我們還是走出了一條活路，而且愈走愈寬廣，靠的不是武力，

而是我們的「軟實力」與「巧實力」，以及受人尊重、讓人感動的力量。我希望外交部以及所有對外工作的同仁，都能繼續發揚這種「軟實力」、「巧實力」，「讓中華民國堂堂正正地走出去，讓全世界高高興興地走進來」。

（摘錄自3月11日馬總統出席外交部部慶酒會暨「百年傳承、走出活路－中華民國外交史料特展」預展之致詞）

- （四）關於「世界衛生組織」（WHO）最近在內部文件中，要求所屬機構稱呼中華民國為「中國臺灣省」一事，我要在此代表中華民國政府表達嚴正立場。

首先，對於「世界衛生組織」這種矮化我國國格的做法，我已經要求外交部向世衛組織提出強烈抗議，我國絕對不能接受這種不公平、不合理，而且是表裡不一的方式。

「世界衛生組織」是一個崇高的國際機構，不能採取這樣不合身分的做法。我也要求外交部，未來如果有這種矮化我國國格、傷害我國主權與尊嚴的情事出現，一定要儘快地提出抗議，絕對不能有任何延宕。

其次，我也要向大陸當局表達嚴正抗議。2008年我就職的時候，在就職演說中曾經明白表示，臺灣要安全、要繁榮，更要尊嚴。唯有臺灣在國際社會不被繼續孤立，兩岸關係才能穩健發展。這次發生的事件，我在這裡必須強調，身為中華民國總統，維護國家的尊嚴，捍衛國家的安全，保障人民的權益，是我不可推卻的責任。

今天「世界衛生組織」有這樣的作為，顯然是受到中共壓力的結果，在這種情況下，我要特別表達抗議。過去3年，兩岸在共同努力、建立互信的情況下，已經有了一些成果，我們必須珍惜這個成果，不要在此時走回

頭路。我要特別強調，兩岸應該累積互信、續創雙贏，用這種方式來傷害臺灣人民的感情，對兩岸都是極為不利的，我們不能接受這樣的方式。

2005年民進黨執政的時候，「世界衛生組織」稱我們為「中國臺灣」(Taiwan, China)，而且限制聯絡窗口的層級不能超過署長(Director General)。但我們在2008年上任後，「世界衛生組織」對我們的稱呼已經變成「臺北」或「中華臺北」，我們的衛生署長以觀察員身分到世界衛生大會，更以「中華臺北」的名義參加會議，大會稱呼他是「Minister」(部長)。

我們上任3年，23個邦交國邦誼穩固，沒有丟掉一個。我上任的時候，給我們免簽證或落地簽證的國家是54個，現在增加到113個，這是我們為臺灣打拼、捍衛中華民國主權、維護臺灣尊嚴所得到的成果。我要請問大家，哪一個政黨對於維護主權、維護尊嚴做得更好？可以讓社會來公評。

今天我們面對的是非常嚴峻的國際局面，大家必須團結起來。國際間對我們的打壓，我們應該嚴正抗議。要突破困難並不容易，但是我們一定要用務實、有效的方法，不能用口號來麻醉人民，必須拿出辦法，在困難的局面中，打開一條生路。所以，一個有擔當、有肩膀的政府，必須用智慧、用方法來突破困難，不能只喊口號。

今天我要在這裡，再一次以中華民國總統的身分向大家報告，我一定會強力捍衛中華民國主權、保障臺灣的安全、維護人民的尊嚴，不達目的，絕不中止！

(摘錄自5月10日馬總統主持向「世界衛生組織」

(WHO)表達我政府嚴正立場記者會之致詞)

(五) 前年我們相見時，正值《臺灣關係法》30週年，這是中華民國在臺灣歷史發展上重要的里程碑。而今年，中華

民國在歷經漫長血汗與淚水的艱苦奮鬥後，達到了另一個里程碑——建國一百年！同時，今年也是我擔任總統的第三年，因此，希望能利用這個機會與大家談談如何用「三道防線」來強化中華民國的國家安全，並確保未來的長治久安。

第一道防線：兩岸和解的制度化

經過3年的努力，兩岸和解已對改善區域的和平與穩定，產生正面的效果，我們在社會各層面都看到兩岸和解帶來的改變。從大陸來的近300萬旅客幾乎是過去的10倍，大大帶動了臺灣旅遊業的發展。兩岸貿易的增加也讓我們在去年（2010）的進出口貿易總額達到了創紀錄的5,260億美元。自從2009年簽訂《海峽兩岸共同打擊犯罪及司法互助協議》後，兩岸警察機關已合作遣返超過100名罪犯回臺灣，較以往增加了50%，並且使得臺灣的詐騙案大幅減少四分之一以上。去年有超過5,600位大陸交換學生在臺灣的大專院校就讀，開啟了今年秋季2千多位新生來臺就讀的道路。我們也看到有越來越多在對岸大量投資的臺商回流，並在臺灣、而非香港上市，完全扭轉了臺商過去的做法。

這些成果都要歸功於政府對於兩岸關係所採取的新思維，也就是放棄阻礙兩岸關係發展、過時的單邊主義模式。著名的外交史教授施瑞德（Paul SCHROEDER）曾研究維也納會議（1814-1815）後導致和平時期之原因，他在結論中指出：「人必須先改變思維，才能改變行動」。

在我就任以前，我們都看到了兩岸關係中的不穩定、不可預測性，特別是不安全感，都在持續地增加。很久之前我就瞭解到，處理兩岸關係一定要有新思維，必須要能強調共通之點，擴大共享利益，善用共同機會，以及淡化彼此的政治分歧。國民黨前主席連戰先生

在2005年訪問大陸的「和平之旅」，踏出了第一步。連先生在北京大學的演說中，呼籲兩岸要一起努力，「化刀劍為犁鋤」，可說適切掌握了這個新思維的核心概念。兩岸之間幾十年來的對抗，也因此出現了改變的機會。

我在2008年上任後，便努力要落實並加速這樣的改變。臺灣因為上個10年的錯誤政策，在亞太地區面臨被邊緣化。為了臺灣的經濟發展及國家安全，必須突破兩岸關係的僵局，因此，我支持所謂「三不」政策；也就是在《中華民國憲法》架構下，維持「不統、不獨、不武」。這個政策不但對兩岸關係的基本結構產生變化，同時也創造了兩岸之間的「良性循環」。

此後，我採取「九二共識」做為雙邊協商的基礎。「九二共識」也就是「一中各表」，已經被證明是兩岸關係持續發展之關鍵。在這個共識下，6次「江陳會」得以進行，兩岸也達成許多務實且難得之突破。在「以臺灣為主，對人民有利」的原則下，至今兩岸已就與臺灣人民息息相關的議題，簽署了15項協議。在此同時，我們也計劃將兩岸溝通的管道制度化，以求能更便利、更可預測，同時更加穩定。從而去年所簽署的ECFA才可能落實，真正獲得實利。一份經濟計量學的研究顯示，在經濟結構有足夠時間逐步調整後，ECFA未來累積的收益將達國內生產額的4.4%，這還不包括其他因為改善服務業、貿易、以及投資環境後所產生之潛在外溢收益。

我也相信，隨著兩岸交流，雙方與第三國之互動也會有所增加。這不僅能夠強化臺灣、大陸及其他國家之相互瞭解，也能進一步引導兩岸關係的發展。換言之，兩岸關係的「良性循環」，對於國際社會不但產生正面的外溢效果，同時也能進一步反饋到兩岸關係。舉例來說，由於兩岸採取「外交休兵」政策，中華民國的邦交

國數目得以穩定維持在23個國家，不像前政府執政8年失去6個邦交國。臺灣現在不但已經加入《政府採購協定》（GPA），同時也在睽違38年後，重回世界衛生大會（WHA）成為觀察員。提供臺灣免簽證待遇的國家與地區，從54個增加到113個。年輕朋友能度假打工的國家，也從2個增加到6個。

這說明了思維的改變，可以產生多麼大的影響。相信這一切，也正是「良治」的核心：不要干涉，而是提供鼓勵的、利於社會發展的條件。藉由這樣的制度化過程，我們建立起諸多明確或潛在的原則、標準、規範以及程序，也讓雙方的期望能有所交集。正由於這樣的交集在兩岸關係中產生可預測性與信任感，因此促成臺海與區域的穩定局勢。我們的第一道防線除了要減少誤判可能性之外，更重要的是，還要讓任何企圖扭轉此種趨勢的成本增加。

第二道防線：增加臺灣在國際發展上的貢獻

目前兩岸關係的突破，已讓臺灣與區域發展更有保障；但臺灣的安全還是得看未來我們在國際社會中的貢獻而定。我認為，臺灣可以在經濟與外交兩方面有所貢獻；在經濟方面，臺灣已經擁有吸引最優質人才，以及成為東亞下一個經貿中心的基礎建設與基本條件。眾所周知，過去60年來臺灣在區域建立的綿密商業與人脈網絡，乃是我們無價的資產。臺灣和大陸的歷史、文化，以及語言關係，更讓我們在廣大大陸市場具有競爭優勢。在此同時，臺灣與日本也有一種特殊夥伴關係，臺日在文化傳統、想法思維，甚至於流行產業上，都有很多共通之處，也因此，兩國的企業往往會一起合作開發大陸市場。這種雙贏的局面，也可複製在我們與其他國家的關係中。

臺灣位居東亞樞紐，在此區域中，沒有其他國家比

臺灣在地理上更有利於掌握商機。任何個人或公司若將總部設在臺灣，前往亞太地區任何地方都很便利。兩岸開放海空直航後，臺灣與大陸的大城市都已緊密相連，不管是鄰海的上海、北京，或是快速發展的腹地城市皆是如此。同樣地，從臺灣到東京、首爾、新加坡、新德里或是雪梨等大都市，交通也十分便捷。

我們有幸擁有了許多「軟實力」，讓臺灣成為國內外廠商眼中理想的發展中心。臺灣的民主與法治，能夠確保個人與公司權利，包括智慧財產權，都不受侵害。臺灣的交通、醫療、教育等基礎建設普及且現代，讓居住在這裡的人們都能享受到高品質的生活。我們也有許多受過高等教育、具創造性、技術熟練的勞工，等待外國公司去運用。我們已經創造了一個令人羨慕的安全社會，任何人都可以在晚上自在地遛狗，或到便利商店買東西。持續的進步讓我們的社會變得更為富裕，而且更適合居住與經商。在兩岸關係穩定的環境下，臺灣因區域連結、地理位置與軟實力等方面的優勢，而能在下一波機會中居於有利地位，同時也能幫助我們的朋友分享這些機會。

外交方面，臺灣也有許多貢獻。做為一個日趨成熟的民主國家，臺灣必須學習承擔對於世界的責任。事實上，臺灣的安全與能否扮演一個「負責任的利害關係者」的角色息息相關；我們的政治與經濟，完全仰賴我們對於國際體系和平與發展的貢獻。這個體系讓臺灣得以繁榮，讓我們的政府與人民能與世界其他地方相連結，並且讓國家能夠持續發展。因此，終止不適當的外交做法，而且採取與國際標準及規範相契合的援外政策，合乎臺灣利益，這也是我們過去3年所努力的方向。

人道援助是臺灣對國際社會提供貢獻的最重要平臺。臺灣的民主發展與經濟繁榮，讓許多非營利組織都

能蓬勃發展。不管是提供經援幫助四川災民重建家園，或是給予海地兒童維持生存的醫療援助，臺灣對世界各地發生大型災害的援助都不遺餘力。當日本發生地震、海嘯及核災之複合式災難後，我們是最早提供緊急物資及派出救援團的國家。對於此次日本震災，我個人深感悲痛，內人與我更在3月的震災募款晚會中，親自接聽來自捐款者所打來的電話。很高興當晚我們就募到了約2,700萬美元善款，政府也提供了300萬美元援助。總計臺灣提供超過2億美元的捐款，是此次日本震災到目前為止最大的捐款國。在日本災難中，臺灣的人道援助，不限於日本人民，我們的華航包機撤離了為數不少的駐日美國公民來到臺灣，並協助他們順利返回美國。這第二道防線就是要讓臺灣站上國際政治的道德高地。

第三道防線：結合國防與外交

目前我們有兩個優先要務：首先，我們要對最親密的友邦，特別是美國，建立起臺灣對外的信用與信任。臺灣必須深切瞭解我們的行為會影響到諸多強權的利益，我們除了不會「找麻煩」之外，還將與相關國家做完整的溝通。

其次，臺灣必須要有自我防衛的決心。我們將在新全募兵制的基礎上，強化防衛力量。對我們來說，全募兵制是個大工程，必須克服來自訓練、組織、財政、軍事準則等方面的困難。然而，我們相信必將能成功建立起一支小而強的軍事力量。與國防力量互補的，還有我們的民主價值、法治制度，以及進步的公民社會，這些都能讓臺灣對大陸的社經發展起了不可或缺的參考作用，這也是我們在國防上的「軟實力」。

有鑒於美國在亞太地區已經投注了相當多的心力，我相信美國以及其他國家都能認同我政府承諾要做一個「負責任的利害關係者」。舉例來說，今年初歐巴馬總

統即公開支持兩岸降低緊張關係，並表示這樣的持續局面將有利於美國以及區域國家之利益。雖然如此，在兩岸關係持續發展的時候，我們也需要美國的協助以站穩腳跟。要和大陸這樣的一個巨人協商並非沒有風險，如果沒有處於一個適當的地位，臺灣就難以在談判桌上與大陸對等。這也就是為什麼我一直希望美國能提供我們必要的防禦性武器，如F-16 C/D型戰機以及柴電潛艦，以確保臺灣領海與領空不受侵害；這對於我們是否能維持可恃之國防來說十分重要。正如美國國防部長蓋茨在去年《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雙月刊上所說：「助人自我防衛是美國最好的自衛方式」。在此同時，美國的參與對於這個由它在數十年前所建立起的國際體系之存續至關重要。到頭來，只有美國堅強的承諾與信用，才能確保東亞地區的穩定與和平不受破壞。

總而言之，一個國家的國家安全戰略必須建立在國內完整的政治支持上。我們的國安政策是基於對於中華民國以及《中華民國憲法》永不改變的認同之上。在臺灣這個充滿活力的民主社會中，不管是對傾向法理臺獨、支持維持現狀，或是期待統一的民眾來說，「中華民國」與《中華民國憲法》乃是大家都能接受的最大公約數。任何偏離或是意圖模糊這個最大公約數的行為，都會對臺灣的國內政治、兩岸關係，以及國際政治產生不必要的不確定性與風險。既然悖離目前政策將影響到東亞所有國家以及臺灣未來的發展，相信我們所採取的做法，乃是臺灣的最佳選擇。

各位親愛的美國朋友們！未來在亞太地區雖然充滿了無限機會，但卻也陷阱重重。臺灣與大陸的國內政治若同時發生改變，將很可能會危害到我們已經取得的成果。彼此對抗、過於自信、或只是片面地追求自己的國家利益，都將對相關各方造成傷害。因此，未來我們

必須要盡力克服困難與風險；對我而言，我們將會全力以赴，讓臺灣漸漸成為國際社會中具有價值的成員，並進而強化自身的安全。簡單來說，我們的外交政策就是「不浮誇」與「無意外」。在此同時，我也盼望今年將代表一個新百年的開端，讓臺美關係能有更大、更好的成就。

誠如美國名詩人佛洛斯特（Robert Frost）所說：「我選擇了一條人煙罕至的道路，但它卻造就了與眾不同。」（I took the one less traveled by, and that has made all the difference.）過去3年來，我們見證了臺灣與亞太地區前所未有的突破以及正面發展。面對未來，我們對於政治的語言、傳達的訊息、表現於外的行動，以及營造的形象，都必須格外耐心與謹慎。我們將努力確保兩岸以及國際局勢都能持續正面發展，對於我們未來的藍圖，也深具信心。

深入來看，兩岸關係在過去3年的進展，反映出一個極為重要的結果，那就是臺灣對外戰略的完全改變。這個戰略結合了兩岸關係、經貿與外交政策，讓臺灣能完全發揮對國際社會的潛在價值。臺灣必須將自己變成一個「和平的締造者」、「人道援助的提供者」、「文化交流的推動者」、「新科技與商機的創造者」，以及「中華文化的領航者」。在中華民國慶祝建國一百年之際，我相信我們政府的大戰略將會讓這個國家在未來更安全、更繁榮，而美國也將如過去一百年一樣，永遠是中華民國未來發展所不可或缺的益友。

（摘錄自5月12日馬總統與美國華府智庫「戰略暨國際研究中心（CSIS）」視訊會議之致詞）

- （六）國際新聞協會自成立以來，一向戮力捍衛新聞自由，不但促進世界各地的民主發展，對於營造良好的新聞工作環境更是不遺餘力。尤其會員們更是捍衛人類尊嚴的鬥

士，堅守新聞專業立場，不諱報導敏感或爭議性的話題，勇於批判強權人士，並協助遭受暴力與威脅的媒體同業。貴會強調新聞自由對於民主發展是不可或缺的，而這正是我個人所秉持的信念。新聞自由除了是《中華民國憲法》保障的基本人權，也是我們民主體制的基礎。

國際新聞協會與臺灣素有淵源，1970年5月，貴會訪問團一行200餘人來訪，獲得蔣介石總統接見，當時臺灣仍在戒嚴時期；1999年5月，貴會在臺北舉辦第四十八屆年會，本人很榮幸以臺北市長的身分設宴，歡迎來自40餘國的300多名會員。今天，貴會在12年後再次選擇在臺北召開年會，意義非凡。由於臺灣已在3年前歷經第二次政黨輪替，年會此次在臺舉行，顯示對臺灣追求民主與新聞自由的肯定。

近年來，貴會多次對臺灣媒體在國際場合的採訪權表達關切。2008年3月，貴會在所屬網站上公開力挺臺灣媒體採訪「世界衛生大會」的權利，並分別在2007年與2009年所出版的年度《世界新聞自由評論》（World Press Freedom Review）中，支持臺灣記者的採訪權。貴會2009年的評論中，更肯定中華民國的新聞自由度遠高於多數亞洲國家，同時呼籲國際社會正視我們要求參與聯合國活動的訴求，以及我國記者採訪國際事件的權利。本人要藉此機會代表我國，感謝貴會對於新聞自由一貫的支持。

臺灣自1987年解嚴後，民主改革進步快速，其中歷經解除報禁、開放組黨、全面改選國會、1996年開始總統直選等，對於後來的政黨輪替助益很大。1988年迄今，新核發的報紙發行執照超過2,000張，報導政治新聞不再存有任何禁忌。而在1999年，立法院更進一步廢除《出版法》，憲法明定的出版與言論自由獲得進一步的

確保。

多年來，根據美國「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的《世界各國自由度調查報告》(Freedom in the World)，臺灣向來被列為「自由國家」，世界各國領袖都把臺灣視為自由民主的燈塔，尤其是美國前總統布希，曾在我3年前當選時來函，稱許臺灣是「亞洲與世界的民主燈塔」(a beacon of democracy for Asia and the world)。這些肯定激勵我們在新聞自由的道路上，更奮力前進。

在歡慶中華民國建國一百年的同時，我們也體認到我國在人權方面的進步是政府與人民攜手努力的結果。唯有自由、能充分獲得資訊的人民，才能組成能夠克服挑戰、締造繁榮與安全環境的政府，讓人民有公平的機會追求夢想。反過來說，也唯有這樣的環境，自由才得以茁壯與成長。這種良性循環讓我們能充滿信心、堅毅不屈地迎接挑戰。例如，自從我2008年上任以來，先是油價暴漲，繼而有金融海嘯引發的經濟蕭條，以及H1N1流感疫情；臺灣已經度過無數的難關。

在經濟方面，過去3年來臺灣經濟強勁復甦，去年經濟成長率高達10.72%，位居亞洲第二、全球第四，失業率也降到5%以下。有關經濟前景方面，在美國商業環境風險評估公司(Business Environment Risk Intelligence, BERI)2011年最新公布的第二次《投資環境風險評估報告》(Profit Opportunity Recommendation)中，我國名列全球第三，僅次於新加坡及瑞士；同時，在瑞士洛桑國際管理發展學院(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Management Development, IMD)所發表的《2011年世界競爭力年報》(World Competitiveness Yearbook)中，臺灣也名列第六。此外，我們也持續進行政府組織再造，精簡中央與地方政府。明年開始，中央機關將由37個部會減少為

29個，同時也將鼓勵地方政府合併升格，以提高行政效率。我們積極改善弱勢朋友的生活，接受政府補助的人數已從26萬人增加到85萬人；同時我們也大幅改善與中國大陸的關係，並與美、日高層重新建立互信。透過我們的努力，目前給予臺灣免簽證待遇的國家及地區，已從我3年前上任時的54個，增加為117個，成長1倍多。

我一直希望中華民國能在國際社會扮演不同的角色。第一個角色就是「和平的締造者」，這也是我何以積極追求與中國大陸達成和解的原因；其二是「人道援助的提供者」，我們之前在海地及5個月前在日本的做法就是如此。我想，許多本區域內的友人都能感受到，無論是對開發中國家或已開發國家，臺灣提供援助向來不遺餘力。我們的救難隊在海地大地震發生24小時內便抵達現場，我還記得當時曾打電話給隊長，從電話中就能感受到他因為救援成功而非常激動，他告訴我：「總統，我們剛從殘垣中救出一名法國人，他是聯合國的工作人員。」這是我們的救難隊首次在海外救出生還者。之後幾天他們又救出另一名生還者，連同其他團隊一共救出7人。

我知道各位媒體朋友十分關注兩岸關係。過去3年，兩岸在經過6次會談之後，終於簽訂15項協議，內容涵蓋直航、航班、食品安全、金融機構的監督機制，以及共同打擊犯罪等。最重要的是，兩岸在去年簽署了《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簡稱為ECFA，為臺灣參與區域經濟整合開啟機會之門。從2000年至2010年，亞洲共簽署58個自由貿易協定，但臺灣甚麼都沒有簽。除了臺灣，另一個沒簽的國家是北韓；這對一個雙邊貿易額超過4,160億美元的國家來說，顯然很不公平，於是我們決定採取行動，首先與中國大陸展開洽商，因為他是我們最大的貿易夥伴。雙方完成協議後，我們不但因為降低

關稅而受惠，就連其他國家也紛紛有所動作，認為既然北京願意改善對臺關係，那他們又何嘗不可呢？這樣的思考邏輯顯然有利臺灣擴展國際參與，而這就是我所說的良性循環。我們改善與中國大陸的關係，同時也改善與其他國家的關係。現在我們正與新加坡協商經濟合作協議。3天前，日本也與臺灣簽訂「投資保障協定」，這是38年前臺日斷交以來，第一次與日本簽訂此類協定，是臺灣歷史上重要的一頁，這顯然要歸功於我們所創造的情勢與氛圍。本人相信，我們不但能因此成為「和平的締造者」、「人道援助的提供者」，更能成為「文化交流的推動者」，以及享有安全與和平所帶來的其他好處。

（摘錄自9月25日馬總統出席「國際新聞協會（IPI）2011年臺北年會」之開幕致詞）